



江湖有酒 庙堂有梦

华夏故国知识人的性情与命运

谢青桐 著

江湖有酒

庙堂有梦

华夏故国知识人的性情与命运

谢青桐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湖有酒，庙堂有梦 / 谢青桐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2014.5
ISBN 978-7-80769-578-3

I . ①江… II . ①谢… III . ①文人－评传－中国－古代 IV . ①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1595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言：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域，是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中国传统知识人崇尚绝对理性的完美，所以他们的从政方式必然是带有浪漫的文艺色彩，而最后也只有以传统文人惯有的悲情和幻灭的方式结束，但却又总是产生始料未及的美学效果，抵达意想不到的哲学高度和伦理深度。

在华夏故国，中国古代知识人以士人、文士的面目活动于社会历史的前台或幕后。无论是入仕为官，还是出世为隐，中国传统知识人的性情体系是一套始终如一的精神价值系统。儒家的执著与厚重，道家的独立与飘逸，佛禅的空灵与觉悟，千百年间，饱经忧患，遍尝苦难，历尽沧桑。伫立于绵绵不断的群山之巅，回眸天下苍生时，目光里闪烁的是儒者的仁厚、老庄的智慧和佛禅的慈悲。这低调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国知识人持久的风骨，道统与美感共存，国家与个体兼济，政治理想与自然生命并行，济世情怀与独立人格同构。

《论语》里记载曾子的言论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中国士人在学习礼乐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终极的价值准绳。道，即

是士人自身人格修养的理想指向，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笃信善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社会和人生的基本信条，被古老的中国先哲言简意赅地指明。道，由此而成为被中国知识人苦苦实践和坚守的精神风骨。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士人群体，被赋予载道、弘道乃至殉道的道德义务、政治责任和人生使命，其呈现出的独特精神风骨就是以身承道，这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风骨的第一个层面。士人风骨的现实表现，就是以道为价值标准来处理与自身行为、与历史、与现实政治权威的关系。在诸多关系中，最能体现士人精神的是他们与政治权威的关系。道德部分的“道”和政治权威方面的“势”出现了尖锐的冲突，面对“势”如何护“道”，是衡量士人品格的一个标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在屈原、嵇康、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一系列中国知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在积极入世与现实社会中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抗争中产生了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以及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奋发进取，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风骨”正是这种抗争精神在人生境界上、在文学审美理想上的体现，如刘勰评屈原的作品，以之“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以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作为华夏士人性情体系核心力量的风骨，发端于先秦，成于南北朝，却盛行于唐宋，这与唐宋士人满腔建功立业的强烈豪情有关。在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指导下，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杜甫的“三吏”、“三别”，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苏轼的“有为而作”，以至明清标举的风骨格调都论证了刘勰的“风清骨峻”不只是一种艺术美，更主要是一种人格美在生命境界和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它就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的体现。

二

书中记载的这些风姿绰约、才情高拔的文人士大夫，一个个都是人中翘楚，他们是官员，是文士，是书生，是学者，是诗人，而根本上，是真正的知识人，

一生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游走徘徊。他们时而被拥戴，成为主流文化精英，高居时代文化的巅峰和领袖地位，时而被贬谪荒地、放逐江湖，迅速沦为被边缘化的罪臣。在跌宕的人生命运中，他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循着共同的心灵根脉走上历史和人生的前台，青少年时代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想启蒙自我，确立自己的教养体系和人生目标。陶渊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都是无比美好的愿景；可一旦“入世”，复杂的仕宦环境和真性情立即发生冲突，政治和人性的艰难险阻与儒家的价值信条随即发生抵牾。个人的弱点，历史环境的缺陷，现实利益的纠结，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总是把热诚的济世愿望和动人的家国理想一次次化作满腔悲情。

当这些儒者们执著而庄严的家国梦破灭，他们的精神世界退向老庄，退向佛禅，退向自然，有的也退向青楼。仕与隐、进与退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宿命和持久的主题，由仕隐冲突而产生的悲剧美学成为中国古代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

这群中国古代的知识人，从庙堂退向江湖，从权力退向审美，从集体退向个人，从公域退向私域，他们终于获得了快乐的解放，他们最有能力用柔弱的心灵释放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支撑大道，担当伤悲，背负苦难，就像到洛阳城外打铁的嵇康，辞官归故里的陶潜，在黄州垦荒种地的苏轼，散淡寻常巷陌的柳永，于潦倒困苦中幡然觉悟的曹雪芹。既然这世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剪不断理还乱，翻云覆雨不可测，既然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个体生命只是可怜的螳臂当车的弱者，那就把炙手可热的官印交出，把威风凛凛的纱帽摘下，他们抱着古老的木琴走进后院，也走进自己的内心。中国历史上少了一名小吏，多了一位大师。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学士自然地形成了非仕即隐、非隐即仕的生存方式，致力于“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一向被认为是积极入世的，因此，古代隐士文化多被归于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进则仕，退则隐”的行为模式也被归于儒道释互补的结果。事实上，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进退两个方面，“进则仕，退则隐”在儒家隐逸文化内部是自给自足的，未必外借于道家消极无为的纯粹逃

逸，这种“身隐心不隐”的仕隐观，也代表中国不得志之文人的普遍情结。

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在儒家的人生态度里，隐逸在更大意义上是与待时而动的曲折进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参与。儒家的隐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时而动的权变，因此在更大的意义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与士人的人格天地之间开辟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这样生命就不会因陷入死角而呈现绝望状态，东山再起就成了普遍期待。事实上，孔、孟等先哲，虽然基本上以布衣终老，但他们的一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儒家隐逸思想的底蕴和基调，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范式。

三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老庄和佛禅对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儒道释的心理互补机制，是成就中国知识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机制，也是被迫选择隐退或者主动寻求隐逸的中国士人风骨的哲学渊源和美学基础，它给多情重义的中国士人带来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调的舒展和文艺审美的风流。

宦海浮沉中，老庄、佛禅对士人的精神助益至关重要。他们常常能于山水的静默观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自然，溪声浪语无非佛法。生死枯荣，月圆月缺，法轮常转，岂分昼夜。希望、亢奋、凄冷和踟蹰，长时间的交替更换，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也促使他们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之外个体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价值。这时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已与知识人的现状经历形成巨大反差，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们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幻梦，他们只有拿庄禅哲学来慰抚自己受伤的心性。

在中国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中，现实功利升华为政治悲情和文艺审美，向外扩散的政治作用力转化为向内聚合的生命情调，性情在质态上呈现为风

流与风雅的人生情境。士人们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实、现世、现象背后的孤独、无常、虚妄与荒诞。这种悲剧哲学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对儒家的功利实现、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脱均无所待，更多的是他们否弃了生活的终极目的的审美特色。来自这些古典知识分子身心中被压抑的强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转化为审美活动中美不胜收的文章和诗行，华章璀璨，文脉深厚，一代又一代，从碑刻铭文到纸帛黄卷，隐退的文人士子们留下斑驳而绵密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他们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等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发生矛盾，但他能用“道”来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借着“自然”的哲学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他在泯去后天世俗熏染后以求返归一个“真我”，在他构造的“桃花源”中实现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苏轼的《前赤壁赋》开篇展现的是一幅逍遥游乐图：清风明月，助人雅兴，举酒颂歌，凭虚御风，宛若仙人。这与庄子《逍遥游》中所展现的场景颇为相似。这种情景让人觉得心境安闲，物我和谐，与道家“虚静”理念相吻合。苏轼面对逆境，以道家的无为思想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涵养心灵，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态，运用道家的自然观、宇宙观进行自我宽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对生命浓烈的热爱之情，对功名狂热的进取之心，对国家执著的爱恋之火，在冷静、熄灭之后，化为“缘起性空”的轻烟缕缕。浓情淡去，深爱消融，这是一个由爱向空的历程，这是一个美学和哲学上的怆然转身，这是一个层层蜕变的觉悟过程。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自信一颗禅

寂的内心就足以驱散世间纷扰，一门一户就足以从精神上隔绝喧闹纷逐的人世。他的诗总是渗透着这种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还是“空山新雨”，到处都充满着天真灵性之美，诗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内在之心。正如王维自己所说，“色空无得，不物物也”。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尽管他在词里写过“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他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就点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佛教将世间万物（佛家叫作“大千世界”）称之为“色”（泛指红尘、物质的情欲世界），同时认为，世界万物（色）只不过是万物本体（空）瞬息生灭的假“相”（又称色相），皆是虚妄，终属虚空，因此“色即是空”。小说第118回中，有一段宝玉与宝钗讨论“赤子之心”的对话。宝玉说：“那赤子之心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个字。”一条苦难的人生之路，是一条执有的人生迷途。这条人生的迷途反过来却成了自由从假回归真的觉悟的人生之路。能找到生死的最终因缘是无明，便达到无无明之觉悟，即谓悟空。对曹雪芹和他的代言人贾宝玉来说，能找到自己究竟的情种和痴根便是悟空了。

对于书中描述的文人学士们来说，出仕与隐逸在他们的生命中交叉而过，分别勾勒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仕隐情结。在仕隐之间的天平上，有着不同的倾斜，有的重在仕，有的重在隐。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者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不同的倾斜从而造成不同的人生轨迹：前者从此成为“欲回天地”（李商隐《安定城楼》）者的楷模，后者则成为出世精神的象征。但他们共同见证的是华夏文人道统精神体系中的绝代风骨。

这样的绝代风骨，这样的性情体系，时而厚重，时而飘逸。当士子的心灵天平倾向国家与政治时，风骨是深沉而凝重的；当他们的心性情怀转向自然与宇宙时，风骨是自由而飘逸的。这样独立的风骨，进退自如的生命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心理韧性，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品格中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今人在公共媒体上津津乐道于欧洲知识分子起源、法国知识分子现象、民国知识分子群体等话题时，殊不知，丰碑早已耸立在中华文化的古老史诗里。

四

独立的性情体系导致了独特的命运轨迹。书中涉及的23人皆为中国古代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古代知识人，他们各自用既迥异又相似的人生遭际，撰写了丰厚而深刻的心灵史诗。这些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文人士子，有的活得隆重，有的活得典雅，有的活得潦倒，有的活得沉痛，但不论属于哪一种，都活得极其饱满、极其纯粹，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具备的精神特质，也是难以企及的灵魂高度，而恰恰又是这种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消逝了的精神奇观，对当代知识人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这组文章的特点，就是采用“新史记”的点评法，全景式、史诗化呈现23位中国古代名士一生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在当今诸多读者无暇阅读大部头传记的时代，让读者像看电影一样，在一两个小时内饱览一位人物，阅尽其一生信息，理解古代士子的精神风骨和华夏道统文化的特质。这种“纵观一生，全景呈现；边讲故事，边做学问；视角全新，材料独特”的写法受美国《纽约客》杂志新专栏的启发，是近年来欧美文史读物的一种风尚潮流，尤其受青年读者喜爱。

从文人士子的角度来勾画文化与历史的脉动，以寻求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特之处，通过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个体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让我和读者一道实现历史“穿越”，和古代文化大师进行“神交”。我历经3年的研究和写作工程，写完这一系列人物，只是希望作出一种尝试，涤荡既往社会意识形态、主流文史研究和文化思维定势强加、附加给这些文人士子们的种种“光环”或“阴影”，恢复其历史与人性的真相。3年多来，我潜心书斋，竭

尽全力对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批文人士大夫作出客观、真实、宽容的讲述，在文献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力求尊重历史、人生、审美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通过对23位中国古代文士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的重新梳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抵御人生困境、历史困境时所产生的非凡的人格力量、生命韧度和文艺美感。

在这组文章中，我特别注重的是书写中国古代知识人群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取舍、徘徊和挣扎的曲折命运，呈现出在儒道释互补的中国文化精神体系中，这些文化大师们在心性信仰、人生意境、文学创作中闪耀出的奇丽火花，体现出他们在遭遇现实逆境挤压和面临历史困境冲突时“化苦难为神奇”的夺目光芒。他们的一曲曲“悲歌”，是政治的悲歌、历史的悲歌、人性的悲歌，更是哲学和美学意义上的悲歌。

退隐、贬谪、流放、挫败、孤独、没落、死亡，这些都是看上去很弱的生命形态，最终却成就了一座座奇丽的文化巅峰和不可攀越的精神海拔。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世间最强大的风骨一定是以最弱的方式呈现的，佛陀的泪，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恻隐，老子的玄淡，庄子的逍遥。这种“弱的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玄妙、最精深的部分。中国的知识人，用诗化的生命轨迹和诗性的文学篇章身体力行了“弱的哲学”、“弱的美学”，铸就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外柔内刚的东方风骨。

强与弱的思辨多么有趣！在佛禅那里，柔弱到“空”，强大到“空”。佛教中有一本经叫《圆觉经》，上面写到：佛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明。所以佛教全部学说的一切都是按照“空”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在动笔写这组文章之前，刚回国不久的我专程去了一趟敦煌。在海外生活两年之后，回归东方文化的心态是亲切而精微的，也是百感交集的。从印度孔雀王朝开始，在佛教传播的洪流中，有一支从西域到达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这条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融合的佛教传播之路被称为佛教的东传。沿着这条路线，能看到古老的中国如何接纳一种空前伟大的智慧的过程，这个交融的过程中，佛教与本土儒、道一旦合流，竟然就产生了可以征服宇宙间一切苦难的威力。

有了这股儒道佛互补合流之力产生的雄健潇洒的东方风骨，中国古代士人就

可进可退，可生可死，可荣可辱，可福可祸，就可以自由选择。最弱的形态，却产生一种始料未及、无所畏惧的坚韧力量。人生可进可退，而且进退不刻意。头顶有一片“道”的星空，身后是一片山水田园。星空下的田园，哪怕孤独一人。世界上，总有一种生活远离苦难。

遥想中国古典岁月里的知识人群体，遥想他们曾经到达过的城市、山川和村庄，长江两岸的香樟树遮掩着古老的村落，上船启程的地方就是离家的码头，去国离乡多少年，在长安、在洛阳、在杭州，梦里始终有那个香樟掩映的码头。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云绕雾缭的青山深处，清净寂寥之域，鱼影穿梭于深潭，花香飘扬于幽谷，他们单纯地行走着，吟诵着，倾听潺潺之水声，拜谒中原或者江南的古刹。穿过紫竹林，登几级台阶，饮新茶，访禅师，清香满衣，天意茫茫。

目录

序言：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001

任自然

嵇康：推上断头台 001

阮籍：旷野的沉默 008

陶渊明：我的田园我做主 023

在巅峰

李白和杜甫：大唐断背考 035

苏轼：大宋达人秀 047

不羁的心

王翰：我的轻盈的夜光杯 081

杜牧：青楼梦好 085

李商隐：相见时难 097

柳永：井水边的流传.....	108
徐渭：疯的藤.....	115

叹浮云

庾信：他乡客.....	123
王之涣：失业在开元年间.....	129
王昌龄：西出长安.....	133
蒋捷：元朝树荫下.....	141
侯方域：桃花扇底是流离.....	145

志难酬

屈原：香草洁癖.....	151
欧阳修：醉翁之意.....	163

陆游：临安剑和雨 173

辛弃疾：杀无赦 185

空门静好

王维：北国红豆 193

白居易：墓里有双相思的鞋 199

曹雪芹：觉悟红楼 211

嵇康：推上断头台

大约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的前一年，在魏国的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一个嵇姓外来户生了个男孩。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孩子日后居然在历史的心窝狠狠捣了一拳，并且让人久久难忘。他的名字，叫作嵇康。

20多年后，大幕拉开，聚光灯唰地照亮，嵇康亮相了。只听台下一片尖叫，无数女生顿时昏倒——嵇康真是太帅了。据说见到嵇康的人，都称赞他如同松下吹过的清风，高昂而从容。“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朋友山涛，评论嵇康时说他如同独立的孤松，连喝醉了要栽倒在地的样子都像即将崩倒的玉山一样，帅得一塌糊涂。很多年以后，有人在王戎面前夸赞嵇康的儿子长得帅，王戎却只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你还没见到他爹呢。”此后，历代史书或笔记小说描述嵇康的风姿仪表都是不惜笔墨，型男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完全达到了庄子“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绝对标准。

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和兄长对他溺爱娇宠，嵇康从小天资聪颖过人，由着性情读了许多道家书籍，对儒家经学几乎不感兴趣。这般过度自由宽松的教育经历，让嵇康的气质里从小就渗透了一股天成的“自然”，而长大以后，那一派“半入仙风”的神韵，就更加让人望而不及，仿佛一个“画中人”，原本就不属于这

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给了嵇康发展的自由，也养成了他骄傲、任性、单纯的人格，单亲家庭的艰难也让他变得激愤而脆弱。

此时，嵇康已经是诗词歌赋无一不通了，他一袭长袍，满腹文章，再背上一把古琴，长风中，往那山头一站，清风明月的神采，竟被惊为天人。

在今天河南焦作市区的东面，有一个县叫修武，又称山阳。20岁离家的嵇康很快就被这里秀美的景色和人文气质所打动，决定长住下来。于是，嵇康隐居在山阳的竹林之中，开了一间打铁的铺子，一边为乡邻打制和修理农具，换取生活必需品，一边埋头做学问，撰写文章，或者出门访友，广结人缘，与众多志同道合者谈书论道。

24岁这年，嵇康带着他的成名作《养生论》来到京城，整个洛阳城竟“惊艳”一般为之倾倒。人们开始兴奋地传说：“真正的名士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去看看那位写下《养生论》的嵇叔夜，你就知道啦。”成名来得如此之快，几个月间，他就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男”。甚至皇室也对他青眼有加，曹操的儿子沛穆王曹林，竟不顾嵇康的平民身份，欣然把女儿长乐亭公主嫁给他，他成了曹氏的女婿。这一切如此出乎嵇康的意料。但与此同时，嵇康也就卷入了魏晋的政治漩涡，做了魏政权的中散大夫。这是他人生悲剧的开端。

嵇康的《养生论》传到黄河以北的怀县，向秀看了后禁不住拍案叫绝，但又觉得嵇康的“帖子”有失偏激，特别是受政治影响较大。向秀在家里想了半天，终于还是忍耐不住，决定亲自到山阳一趟，去见见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就文章里的问题讨教一二。向秀于是拿着自己对《养生论》的意见稿《难养生论》去见嵇康。嵇康此时正在家里的铁匠铺子里帮人打制农具，他光着膀子，用钳子夹出炉子里已经烧红的锄头，放在铁砧上，挥动大锤向锄头打去。

小小的铁匠铺里，火星飞溅，烟尘弥漫，迎视着嵇康傲岸、冷峻、挑剔、审视的目光，向秀镇定自若，底气很足。向秀说：“你太屌了，不是常人啊。你是这个黑暗时代最明亮的星辰。”嵇康骂了他一顿：“这些恭维话又酸腐又虚伪，我偏不爱听。告诉你，我就是一个铁匠，打铁的，不是什么文化精英。”哥儿俩就这样不打不相识，他们在河边散步，谈古论今，在铁匠铺中打铁，嵇康抡锤，向秀拉风箱。两人虽然有分歧，但是彼此都很快乐，觉得找到了平生的至交。